

doi:10.13582/j.cnki.1672-7835.2021.03.008

偏见与忌憚:格拉西安《漫评人生》 三类女性形象及其意义

陆仪婷^{1,2}

(1.湖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1;2.中南大学 外国语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3)

摘要:《漫评人生》中的女性形象主要分为三类:贵贱两级的世俗女性,象征善恶的神化女性以及臆想中既完美又有缺憾的理想女性。整体来说,书中对于三类女性都抱有偏见和忌憚,其主要根源来自天主教父权制思想的熏陶以及家庭和社会的影响。巴塔萨尔·格拉西安特殊的经历注定了他的女性观有其主观性,但反过来透过他的作品我们又能客观地看到17世纪西班牙社会真实的女性形象,她们用自己的成就改写着男性作家的女性观。

关键词:《漫评人生》;巴塔萨尔·格拉西安;女性形象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7835(2021)03-0052-07

《漫评人生》^①(*El Criticón*)是西班牙黄金世纪作家巴塔萨尔·格拉西安(Baltasar Gracián, 1601-1658)发表的一部寓言式的小说,作者运用了大量暗喻、象征、双关去吸引有思想的“读者去猜测”当中的深意^②。作品中构建出的深文隐蔚的世界打动了包括叔本华、尼采在内的众多思想家,也使得这部作品成为了一部打破时空界限的世界级经典。在出版后的几百年间有无数学者对《漫评人生》进行过多角度的研究,然而其中的女性形象却少有人关注。尽管该作品的主角都是男性,但维系两位主角关系、推动故事情节发展以及始终围绕在主人公周围的都是女性。在当代形象学研究中,“他者形象不再被看成是单纯对现实的复制式描写,而被放在了形塑者与被塑者,‘自我’与‘他者’的互动关系之间进行研究”^③。《漫评人生》中的女性形象就像符号一样,被作者赋予了群体性的身份和意义。这也就意味着对这些

女性形象的研究不仅仅是在对那个时代女性本身真实形象的追溯,同时也能看出“形塑者”自身与所处社会对于女性的主观认知和刻意建构。这种塑形也就是女性主义研究者们认为的“对一种关系、一种隶属于某个阶级、团体、类别的关系的再现”^④。这种再现既是社会现实的再现,也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再现。作为典型的深受天主教文化影响的男性作家,格拉西安笔下的女性形象也没能躲过“男性书写文学中无处不在的‘天使’与‘怪物’形象”^⑤。但在这种二元对立的主流意识形态之外,他还有着不一样的划分与认识。本文依据女性群体自身的存在性质和作者秉承的态度将《漫评人生》中的女性形象分为:两极化的世俗女性、象征化的神化女性、臆想化的理想女性三类。透过对这三类女性形象可以剖析出作者所处时代社会对女性的普遍认知和新认知。

收稿日期:2020-11-19

基金项目:湖南省社科基金外语科研联合项目(19WLH36);湖南省社会科学成果评审委员会项目(XSP20YBC212);国家留学基金委资助项目(202006720010)

作者简介:陆仪婷(1990—),女,湖南邵阳人,博士生,讲师,主要从事西班牙语文学研究。

①此书名借用海南出版社2010年同名译著的译法,因为该版本为国内目前唯一的中文译本,译者为北京外国语大学西班牙语系的张广森教授。后文所有引用的译文则是笔者对照西班牙天主教王费尔南多出版社2016年评注版的*El Criticón*自行翻译。

②Navarro, Miguel Romera. “Evolucion de la critica sobre *El Criticon*”. *Hispanic Review*, 1937, 5(2):140.

③孙燕:《女性形象的文化阐释》,《中州学刊》2004年第5期。

④佩吉·麦克拉肯:《女权主义理论读本》,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04页。

⑤Gilbert, Sandra M., Gubar, et al. *The madwoman in the attic: The woman writer and the nineteenth-century literary imagination*. New Haven: Yale UP, 2000, p.44.

一 两极化的世俗女性

世俗女性与另外两类女性的区别就在于是生活在人世的普通女性,具备人的基本特性。这个对象包括作者在作品中提到的人类历史中真实存在过的女性,也包括未指明具体对象但具有普遍性意义的女性。这类女性在作者的笔下呈现出两极化的差别,所反映出的社会现象以及作者的心理也各有区别。然而这种世俗女性形象的两极化与“天使”“怪物”的传统二分法并不完全对应,而这种差异恰好能看出17世纪男性对女性认知的某些新转变。

(一) 世俗女性的文学形象

西方文学向来有书写女性负面形象的传统,这主要是“由古希腊罗马文学决定的,后来的女性形象虽然有所变化,但是,根本模式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变”^①。希腊神话中出现的第一个女性就是潘多拉,是她打开了装满痛苦、祸患的盒子,将不幸带给了男性,从此女性就成了邪恶的代名词。《漫评人生》中第一次出现世俗女性时也被冠以“魔鬼”的名称^②,在作者看来“有女人的地方就一定有魔鬼”。魔鬼在天主教当中的意象是堕落混乱没有灵魂的,这正是作者眼中世俗女性的形象。她们具有强烈的诱惑性,如果不是上天早就警示过女色会引人入歧途,“男性早就不会存活于世了”。此外格拉西安笔下的世俗女性还是极有攻击性的,她们“群体合一”来对付男性,最终“主宰世界,世上的一切都依附于她们”。从这些文字都能看出作者所代表的男性群体对此充满了敌视和忌憚,因为这样的行为“颠覆和解构男权秩序,她们破坏了男性社会中固有的秩序,令人望而生畏”^③。而在普通世俗女性中作者还塑造了修女的形象,她们“从事的并非是规矩的(修行),而是一心想要远离空门,追求俗世欲望”,生活的修道院也“充满了邪恶气息,上帝保佑才能免受其害”。她们本是有着天主教信仰并自愿献身上帝的女性,却也没能逃出作者的偏见。

亚里士多德在《诗学》(Poetics)中明确指出:“让妇女表现男子般的勇敢与机智是不合适

的。”^④亚里士多德的表态也奠定了西方男性书写中对女性智慧和勇气的贬低。然而格拉西安笔下却有一群让作者不吝赞美之词的世俗女性,她们让作者承认“的确有胜于男人的特例般存在的女人”。这个群体中首当其冲的就是作者所敬仰的女王伊莎贝尔(1451-1504),她以卓绝的才能为西班牙在世界史上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格拉西安还塑造了一系列美好的女性形象:他用“不朽的凤凰的翎毛”来形容贤德的波旁伊莎贝尔王后(1602-1644),用“最美好”来形容慈爱的阿斯图里亚的玛格丽塔王后(1584-1611)。夸赞像“亚马逊的女战士”^⑤一样维护国家或者领地平安的奥地利安娜王后(1601-1666)、波兰玛利亚王后(1611-1667)以及加泰罗尼亚的卡多纳公爵夫人(1589-1646)。还有“为信仰而打败整个世界”的玛格丽塔修女和她的侄女多罗特阿修女,她们选择抛下珠宝首饰、美丽容颜,皈依教门清修的行为在格拉西安看来是充满“伟大勇气”的壮举。这些被作者不厌其烦地一一列举的世俗女性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都出身于王公贵族这样的豪门世家,也都做出了一些惊人的壮举,给国家或者人民带来了好的影响。与前面被极度丑化和贬低的女性形象不同,这些源于真实女性的形象在格拉西安笔下呈现出光辉灿烂的面貌。

(二) 世俗女性的现实影射

伊丽莎白·凯蒂·斯坦顿(Elizabeth Cady Stanton)在她的《妇女圣经》(The Woman's Bible)中指出《圣经》修订者为了将男性放在高于女性的位置上,以此来证明女性生来的从属地位和男性的主导权,对《圣经》第一章中原本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亚当和夏娃的内容进行了修改^⑥,之后的男性阐释者们和教会有意识地将修改后的故事发展和传承了下来。菲莉斯·特丽波也在她的《圣经与性修辞》(God and the Rhetoric of Sexuality)中表达了同样的观点^⑦。作为天主教作家,巴塔萨尔·格拉西安的思想无疑受到教会和《圣经》的影响,他对于女性的基本认识和态度也

① 闻蔚:《西方文学中女性形象探微》,《社会科学家》2013年第2期。

② Baltasar Gracián. *El Criticón*, edición crítica de Luis Sánchez Laílla y José Enrique Laplana Gil, anotación de Luis Sánchez Laílla. Institución Fernando el Católico, 2016, p.50.(下文引自该著作的不再另行标注)

③ 杨晓莲:《西方文学中男权视角下的女性形象》,《重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9期。

④ 邹广胜:《西方男权话语中的女性形象解读》,《外国文学研究》1999年第3期。

⑤ 传说中生活在亚马逊流域的骁勇善战的女性。

⑥ Stanton, Elizabeth Cady. *The Woman's Bible*. New York: European Publishing Company, 1985, pp.20-21.

⑦ Trible, Phyllis. *God and the Rhetoric of Sexuality*. Philadelphia: Fortress Press, 1978, p.36.

与传统天主教所树立的女性形象有着密切的关系。教会的《圣经》里说上帝怕亚当孤独,于是从他身上抽出一根肋骨,从而创造了夏娃。在蛇的诱惑下,夏娃怂恿亚当一起偷吃了禁果。这位女性始祖不仅自己没经受住外界的诱惑,还导致男性始祖也犯下了错,这就更是罪不可恕。“因为受骗犯罪的不是亚当,而是夏娃。”(《提摩太前书》(Timothy))。《创世纪》(Genesis)中的这段描述其实就构建了女性的基本形象,她的地位低于男性,是原罪的起点,却并不服从,而是反叛,给男性招来了祸患。这与格拉西安笔下普通世俗女性的形象不谋而合。在格拉西安生活的时代,尽管女性地位没有发生实质性的改变,但西班牙社会女性在公共场合抛头露面的现象也比之前要常见得多,女性们想要逃离家庭束缚或者男性监管的意愿比以往都要强烈,在言行举止上也显得更开放外向。这在当时旅西的外国人游记中有过明确的记录:“她们享受着伟大的自由”,并且“像男性一样不分昼夜地在街道上闲逛。任何人轻易就能与她们攀上话并很快就能得到回应”,此外她们还会主动“向街上的任何一个人索要零食、午餐、水果、甜品等等”^①。作为游客的描述,这未必是普遍现象,但当时的女性相较之前,确实有了更多的自由,她们被允许“前往教堂”,也可以“挽着丈夫或者情人的手参加城里几乎所有人都会参加的公共庆祝活动,甚至有时也能去剧院”^②。这样的现象和改变在格拉西安看来是世风日下、女性堕落的表现。

对于女性主义的理解“既要联系历史又要考虑地缘政治因素,只有这样才能涵括它在各地所呈现的各种形态以及这些形态之间的相互关系”^③。格拉西安笔下的普通世俗女性形象也与地缘政治有着密切的联系。此时的欧洲经历了16世纪自上而下的宗教改革,西班牙坚持推行的反宗教改革政策不仅“未奏效,反而加剧了其与属地之间的分歧,以至于这些区域纷纷采用了

‘异端’潮流来与之抗争”^④,使得新教带来的变革在欧洲范围内迅速蔓延开。受宗教改革影响,大量修女离开修道院,返回俗世甚至通婚。这与《玛窦福音》(Matthew)中明确提到的上帝说教士修女们要“为了天国而自己放弃结婚的权利”的旨意相悖。为了对抗汹涌而来的改革浪潮,罗马教廷在意大利召开了特伦托会议,该会议坚定了传统的中世纪教理,其中“对于神化人员独身的坚持,以及禁止女性担任宗教领道人的传统训谕”在西班牙得到了极大的体现^⑤。该会议一方面肯定修道院是“女性美德制度化”的体现,另一方面却经由裁判所对其中一些具有影响力、号称经历异象的修女和守贞女^⑥进行审判和制裁,这实际就是对傲慢的天主教男权传统的维护。这一时期修道院修女被魔鬼附身的故事也层出不穷,这也可以看作是教会体系中男性对于女性的“控制、赞助和压制”的矛盾心理^⑦。宗教女性们为上帝献出一切的行为本身是符合教规的,但对女性修行者信仰坚定性的怀疑以及对宗教女性影响力超过男性,从而凌驾于男性权利之上的恐惧使得教会男性表现出长久的猜忌和敌意。对女性修行者如此,对普通世俗女性则更甚,这也印证了格拉西安对于女性群体力量的忌惮。

而书中以正面形象出现的世俗女性无疑与史实是有联系的,因为“女性的社会地位不仅与她的性别角色,而且与她的经济地位和种族身份相统一”^⑧。在经历了15世纪末的“光复运动”和哥伦布的“发现新大陆之旅”后,西班牙在伊莎贝尔女王和她丈夫的统治下,实现了王国的统一。在此期间,早已在意大利兴盛的文艺复兴思潮也自上而下从西班牙王室向人民大众中传播开,为西班牙历史上的“黄金世纪”^⑨奠定了基础。格拉西安生活在腓力三世和腓力四世父子统治之下的西班牙,此时正是国家由盛转衰的17世纪,他只叹“美好的时代已经逝去,一切美好的事物也随之而去”。因而对像伊莎贝尔女王这样缔造了西班牙

① Mercadal, J García. *España vista por los extranjeros: II, Relaciones de viajeros y embajadores (siglo XVI)*. Biblioteca nueva, 1920, p.260.

② Defourmeaux. Marcelin. *Daily life in Spain in the golden age*. trans. Newton Branch. Allen & Unwin, 1970, p.158.

③ 苏珊·斯坦福·弗里德曼:《图绘:女性主义与文化交往地理学》,陈丽译,译林出版社2014年版,第5页。

④ Herradón, óscar. *Historia oculta de los reyes*. Madrid: América Ibérica, 2010, p.128.

⑤ 夏伯嘉:《天主教世界的复兴运动:1540—1770》,余芳珍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160页。

⑥ 守贞女与修女性质不同,是因负担不起费用而生活在修道院以外世俗环境中的宗教女性。

⑦ 夏伯嘉:《天主教世界的复兴运动:1540—1770》,余芳珍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160页。

⑧ 邹广胜:《西方男权话语中的女性形象解读》,《外国文学研究》1999年第3期。

⑨ “黄金世纪”一般来说指的是16世纪至17世纪中叶西班牙古典文学发展的黄金时期,但同时也用来指同一时期西班牙帝国发展达到鼎盛这一阶段,此处做后者解释。

牙辉煌历史的世俗女性表现出极大的推崇和敬重。她们居高位能忧国忧民,为国出力,这是许多男性所无法企及的。另一方面,修女还俗的现象让格拉西安无所适从,而那些能逆流而上放弃俗世的荣华富贵,选择过清贫生活、将自己的一切奉献给上帝的王公贵女们则显得光辉而伟大。尽管这些王公贵女们有着各自不同的经历,但她们靠自己的智慧和勇气为世俗或宗教社会的繁荣发展贡献了自己的力量,让作者刮目相看。这多少改变了男权社会里经济、政治、教育地位低下的“男子的等级胜过了富裕的甚至受过良好教育的妇女的社会地位”的“奇观”^①,也让格拉西安笔下的世俗女性形象有了截然不同的面貌。

二 象征化的神化女性

神化女性与另外两类女性的区别就在于并非真实生活在人世的女性,而是具备神性的特征,格拉西安在文中也多次用“女神”“女王”或者“女妖”这样的词来进行描述。这个对象指的就是具有象征意义的无数神化女性,本文从她们所象征事物的善恶属性来区别分析两类女性的形象。这些神化女性在象征意义之外也清晰地呈现出作者对于女性形象的认知。

(一) 神化女性的文学形象

苏珊·格里芬(Susan Griffin)认为男性害怕受女性诱惑而失控,所以他们“抗拒女人的形象……将她塑造为邪恶的化身和毁灭的根源加以防范”^②,这也是众多文学作品中女性总以妖或者魔的形象出现的原因,但这并不限于外表形象。《漫评人生》中出现的第一位具有神性特征的女性有着“外貌慈眉善目、口吐甜言蜜语、双手温柔爱抚”的形象,然而这位看似对孩子无微不至、百依百顺的女性转身就将那些懵懂无知的孩子送入了豺狼虎豹的嘴里,这样的表里不一和冷酷无情正是作家眼里女性的本来面目,即使她表面是“母亲”的形象。两位主人公在人生之路上还曾和许许多多其他人一起被一位有着“超凡脱俗之美”的女强盗所俘虏,她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将人牢牢地束缚住,不少人被她折磨得头破血流。这里影射的正是女性与生俱来对男性所产生的致命的诱惑力。在众多女妖中有一位非常突出的女子,她自称是男主人公安德雷尼奥的“表妹”又号

称认识另一位男主人公的妻子。这位叫“法尔希蕾娜”的女妖不仅热情貌美,还很慷慨,更是将两位主人公的身世讲得相差无异,骗取了二人的信任,然而最终等来的只是“钱财、珠宝、衣物、自由和尊严全被卷走”。格拉西安想借女妖形象提醒所有的男性要擦亮眼睛,不能被女性美貌外表和花言巧语蒙骗。

男性对于女性群体的“担忧和恐惧,在文本中的再现有两种可能形式:或将女性妖魔化,宣扬‘厌女症’(misogyny);或将女性理想化,鼓吹‘女人神话’”^③,这点在《漫评人生》的神化女性形象中有着明显的体现,在作者笔下两者是此消彼长的关系。上文介绍的貌似母亲的女妖将孩子带入歧途,另一位“被光芒所环绕”“美得无与伦比”的女神就立即从天而降,救这群孩子于水火,还送给每人一颗“能让人避开祸端、冷静下来”的宝石,帮助他们学会理性地判断事物的黑白是非。被女妖“法尔希蕾娜”耍得晕头转向之后,两位主人公幸运地被指引去了“阿尔特米娅”女王的宫殿,她能“禽兽变成具有理智的人类”,是“上天的嫡传”“超凡大脑的延续”。在这位女王的教导之下,主人公们对自身以及对世界都有了全新的认识,不再轻易被蛊惑。作者笔下这些象征美的女神不仅外形上有着神圣不可侵犯的美,而且行动上始终都以自身美好的品德去影响和感化包括两位主人公在内的芸芸众生,与女妖形象形成了鲜明的反差。

(二) 神化女性的象征意义

两位男主人公的旅途表面上是历经艰难险阻的朝圣,实际象征的正是人的一生,而这些神化女性则象征的是人的各种品性。两位主人公最初遇到的那位当面宠溺孩子、背面就将孩子丢弃于野兽之口而不顾的正是人的“自然性”,她与生俱来,看似让人顺心顺意,实则是捧杀。安德雷尼奥在母爱缺失的环境中长大,对此格外渴求,因而看不透故意骄纵宠溺的人性本恶。而将这些误入歧途的孩子带回正途,并教授辨别是非曲直方法的女神则是与“自然性”相对的“理智性”。格拉西安借这位理性女神想告诉读者的是世人要想平安成人,就必须学会用理性的头脑去思考问题,而不能肆无忌惮地释放天性。两位主人公在路途不

①凯特·米利特:《性政治》,宋文伟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45页。

②苏珊·格里芬:《自然女性》,张敏生、范代忠译,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1页。

③傅美蓉,屈雅君:《社会性别、再现与女性的他者地位》,《妇女研究论丛》2010年第3期。

幸被俘虏,用的是他们各自“所喜欢的枷锁”,那位女强盗只需动动嘴皮就能让人乖乖地跟着她走。她所象征的正是人间的各种“享乐”,人们总是心甘情愿地沉醉其中不可自拔,到头来一事无成。而那位卷走安德雷尼奥和克里蒂洛全部财产、将他们耍得团团转的女妖,从名字中就可以看出其真面目,“法尔希蕾娜”^①正是“虚假的女妖”,她能用各种甜言蜜语将男人诓骗。在人生中为了提防这样虚情假意的人,格拉西安为主人公送上了与“审时度势”“经验”“需求”“理智”都有着密切的亲缘关系的“阿尔特米娅”^②,她的神力能帮助人们认清事物的本质,这象征的正是人生之旅中不可或缺的“智慧”。

象征化的神化女性都是格拉西安用心塑造的形象,主人公与她们的相遇正是人生不同阶段不同性格的养成时期,而她们的神力象征的则是人类各种品性会对自身产生的不同影响。作者是想借这些象征恶的神性女子向世人传达他的态度:女妖们都以各自不同的诱惑力吸引着人世间来来往往的过客,也使得无数的人们落入陷阱再不得脱身,所有人都该远离这些恶癖。那些女神们优雅的言行举止则传达了作者对于美好品德的推崇,这些美德也是包括男性、女性都在内的所有人都需要去修炼的。因为“个人通过女神而参与到存在的伟大神秘之中:自我融合于宇宙、大地和社会。在那种状态下,人与自然的矛盾同人类内部的性别矛盾一样都处于蛰伏状态”^③。而这些也正是作者在作品中塑造神化女性的主要意图。

从前文的分析还可以判断出作者将人类这些品德冠以女性形象的原因有三:第一,书中多处援引“维纳斯”“贝婊娜”等古希腊罗马神话中的女神形象来说理,可以看出他深深受到这一文化背景的影响,也就不难理解会对神化女性这一传统形象进行借鉴和改造。第二,象征恶的女性形象需要有轻浮、伪善的面貌,而这样的特点和形象在作者眼里正是女性所具备的,因为“对人类邪恶的体现者和投射对象应该就是女性”^④。第三,神圣的女性形象“可以表达一种自然力的象征(生育、生命和死亡);或是意指某种女性力量的象

征”^⑤,这是女性的自然特征所决定的。我们也可以看出作者对于世人的规劝其实也是在对女性的规劝,女性们只有安分守己、修身养性方可成为像具有美德的女神一样。当然象征美的女神也能看出作者对于女性美好一面的认可。这样一群被象征化的神化女性也是作者眼里女性美与恶的体现。女性在男性文学中扮演的这种双重角色“反映了男性对于女性的矛盾态度”^⑥。神化女性在作者笔下既是美梦又是恶梦,但总而言之,是一个符号化了的他者。

三 臆想化的理想女性

理想女性与另外两类女性的区别就在于她是介于世俗女性与神化女性之间的一种兼有人性和神性特征的女性。换句话说她是世俗女性和神化女性中好的一面的集合体。在《漫评人生》中这个对象主要指的就是两位主人公自始至终都在苦苦追寻的女性“菲莉辛姐”,在她身上能看到西方圣经文化传统衍生出来的“‘贤妇’形象”^⑦。

(一) 理想女性的文学形象

之所以说“菲莉辛姐”是兼有人性和神性特征的女性,是因为她不仅出现在主人公世俗生活的轨迹中,也与神性之人有交集,且具有如同女神们一样的象征意义。“菲莉辛姐”是另一位男主人公克里蒂洛年轻时的心上人,她“高贵且具有所有与生俱来的美好品质,漂亮、聪明且年轻”。在他为追求真爱被陷害落狱之时,虽“伤心欲绝”却仍为他的“勇气和柔情而感到高兴”。女妖“法尔希蕾娜”说她“秘密地嫁给了一位既有智慧又重情义的绅士……独自一个人靠着勇气和尊严生下了孩子”,而这个绅士自然指的就是克里蒂洛,孩子则是生来就不知道自己身世的安德雷尼奥,因此“菲莉辛姐”同时拥有妻子和母亲的身份。然而书中的“菲莉辛姐”明显又不仅仅只是一个世俗女性,在获取“勇气”的过程中,两位主人公就被告知“‘彼尔特莉娅’女神将会指引他们找到终其一生都在找寻的‘菲莉辛姐’”。而最终在“解密菲莉辛姐”一节中,两人又被告知世人终其一生都在寻找的她已经“辞

①法尔希蕾娜的西班牙语原文为“Falsirena”,该词为作者杜撰的名字,由“falsa”和“sirena”两个词合成,意为虚假的女妖。

②阿尔特米娅的西班牙语原文为“Artemia”,该词为作者杜撰的名字,词根是“arte”,意思是才艺、智慧。

③叶舒宪:《西方文化寻根中的“女神复兴”——从“盖娅假说”到“女神文明”》,《文艺理论与批评》2002年第4期。

④闻蔚:《西方文学中女性形象探微》,《社会科学家》2013年第2期。

⑤叶舒宪:《西方文化寻根中的“女神复兴”——从“盖娅假说”到“女神文明”》,《文艺理论与批评》2002年第4期。

⑥罗婷:《女性主义文学与欧美文学研究》,东方出版社2002年版,第212页。

⑦李滢波:《〈旧约圣经〉中女性形象的文化解读》,《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3期。

世去了天堂”,只有在天堂才能找到她。这些文字描述都让人深觉这位女性并非凡人。

除了“菲莉辛姐”的人生轨迹外,格拉西安还在书中安排了一场看似与她无关的学术沙龙,但其实这场沙龙设置得别有深意。首先这场沙龙是两位主人公马上要见到“菲莉辛姐”时遇上的,其次在场的都是人中俊杰,发言的也都是思想界的大拿,他们的话举足轻重。在这个题为“何谓幸福”的讨论中大家各抒己见,每个人都发表了各自对于幸福的认知,但无论谁提出的观点如何有道理,总会被另外的人反驳。最终一个疯子得出的“人世处于天堂和地狱之间,因此悲喜交加……尘世没有绝对的幸福”的结论反而获得了大家一致的认可。这个结论连同这场沙龙实际上进一步明确了“菲莉辛姐”的形象,她存在于天堂。而指引主人公们来此的人也证实了她就是“尘世之人从生到死一直在寻找的幻想中的‘幸福’”。

(二) 理想女性的创作意图

男性作家们笔下的女性形象“实际上就是男性对女性世界的想象和男性对女性世界的价值判断”^①，“菲莉辛姐”身上所体现出来的特点传达出作者对于理想女性的一种美好设想。她是“上帝赐予的聪明、高贵、富有、美丽且具有德行的妻子”，而她被迫与丈夫分开之后拒绝了无数爱慕者的求婚，恪守妇道、忠于爱情的行为和佩内洛普^②一直为人所传颂的事迹如出一辙。这与天主教文化中对于女性的设定不谋而合。《圣经》中夏娃是上帝为亚当而造，由此奠定了“男人与女人之间的关系成了一个维系权威与服从管辖的权力游戏”^③。在父权制社会里，丈夫“掌握了权柄，而妻子则被贬低，被奴役，变成丈夫淫欲的奴隶，变成单纯的生孩子的工具”^④。这就要求她们“贞洁和顺从的，在家忙不停、在外嘴不张”^⑤。“菲莉辛姐”这一理想女性的形象无疑就是经由圣经思想造就的“贤妇”，是对女性地位和能力的偏见。

此外虽然在文中作者两次明确提及“菲莉辛姐”作为安德雷尼奥母亲的这一身份(其中一次还是从虚假女妖连篇的谎话之中)，但与两位男主人公之间亲密的经历和情感比起来，这种母亲的身份显得空虚而单薄。可以说在这位理想女性的身上我们又看到了母亲身份的缺失。根据学者阿道夫·科斯特(Adolphe Coster)的研究，出于对女性的抵触，格拉西安甚至从未在任何作品中提及过他的母亲，这也和“十六和十七世纪西班牙文学女性主义评论中母亲角色的缺失”传统有关，这样的文学作品“在展现出破碎家庭的同时也展现出对女性意愿和智慧的抗拒”^⑥。母亲这一角色因其哺养和教育的天职而显得在家庭地位和才能上要高于男性，这是男性作者们所不能接受和认可的。因为“女人由于其生育本能而与自然界相联系，饰演了他者或对象角色，与上帝(以及男性)的自我或主体性角色相对峙”^⑦，所以她们的对立性也是男权社会里的一种普遍认知。由此我们也可以理解为什么“菲莉辛姐”身上母亲这一身份显得如此不称职，它体现了男性对于女性生理身份的一种忌憚。

“菲莉辛姐”具有神性特征除了她的命运和神化女性有关联外，最重要的是作者创作意图上的象征意味。这个名字就包含了“幸福”^⑧的意思，而那场“何谓幸福”的沙龙其实就是在探讨人一生所追求的幸福到底意味着什么。作者最终给出的答案却是幸福在尘世寻不到，需要去天堂。这也符合天主教对于人生在世是来赎罪，获得救赎死后飞升天堂才能获得幸福的理念。而“菲莉辛姐”最终的命运是与两位男主人公彼此错过，这样的一个隐喻也说明了在“母亲”“妻子”和“幸福”的内涵之外，这位理想女性还是“天主教教士格拉西安不允许夫妻、母子三人团聚的厌女症的象征”^⑨。格拉西安对于世俗女性群体的偏见也

①杨晓莲:《西方文学中男权视角下的女性形象》,《重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9期。

②在《荷马史诗》“奥德赛”一篇中,为了等待丈夫奥德修斯从特洛伊战场回来,佩内洛普以给公公职衣服为由拒绝了众多求婚者的纠缠,但是她会夜里把白天织好的衣服又拆掉,这样苦苦支撑到丈夫归来。

③南宮梅芳:《圣经中的女性》,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92页。

④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59页。

⑤Carole Levin, Jeanie Watson. *Ambiguous Realities: Women in the Middle Ages and Renaissance*. Wayne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87, p.14.

⑥Bergmann, Emilie. “Mujer y lenguaje en los siglos XVI y XVII: Entre humanistas y bárbaros”. *Actas del XII Congreso de la Asociación Internacional de Hispanistas*, 2011(2):33-41.

⑦梁工:《女性主义文论与“圣经”批评的互动关系》,《文学评论》2010年第2期。

⑧菲莉辛姐西班牙语原文为“Felisinda”,词根“feliz”就是幸福的意思。

⑨Tenorio, Alejandro Tenorio. *Lectura crítica, ideológica y estilística de la “crisi séptima” de la segunda parte de “El críticón” de Baltasar Gracián, intitulada “El hierno de Hipocrinda”, a la luz del contexto ligüístico y extralingüístico*. Universidad Complutense de Madrid, 2013, p.257.

来自亲身经历。他的父亲就曾表达过“最具智慧的女子的才能也比不上任何一位年过十四的男子”,作为让父亲“骄傲的儿子”,巴塔萨尔“不仅厌恶女性的过人才智,还憎恶她的美貌”^①。此外格拉西安也曾有一位交好的教会朋友,因为沉迷男女的情爱,结果被解除教职,逐出了教会。这件事对他打击很大,也让他对女性产生了更深的偏见,认为她们的罪恶才使得男性走上歧途。这些诸多原因的叠加奠定了格拉西安对于女性群体的复杂情感,也使得他笔下精心塑造的“菲莉辛姐”成了一位臆想化却永不存在的理想女性。

结语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格拉西安在《漫评人生》中书写的众多女性形象可以分为世俗女性、神化女性以及理想女性三类。其中世俗女性有着两极化的形象:普通的世俗女性在作者笔下是把男人引入歧途并企图控制世界的魔鬼;高贵的世俗女性因为对社会和国家有着杰出贡献而受男人景仰。神化女性的形象具有丰富的象征意义:女妖象征着人生需要摆脱的恶癖欲望,女神象征人生需要修炼的德行智慧。理想女性是作者臆想出的形象:是善良忠贞的妻子也是缺位的母亲,同时

还象征着男人们永远无法追寻到的“幸福”。通过对这三类女性形象的构建可以看出作者对于女性始终带有偏见和忌惮的心理。对普通世俗女性的贬低、对神化女性性别的设置、对理想女性贤妻身份的限定都是偏见,对普通世俗女性凌驾男权之上的不满、对女妖的恐惧、对理想女性母亲身份的损害以及男性求而不得的命运都是忌惮。但这种偏见和忌惮的心理实际上正是对现实中女性能力的一种肯定,而世俗女性中王公贵族们的成就也让作者不得不承认世上确有超过男人的女人。

正如傅里叶(Charles Fourier)的那个著名观点一样,“某一历史时代的发展总是可以由妇女走向自由的程度来确定的”^②。尽管格拉西安书写《漫评人生》中的女性形象时没有摆脱男权制的傲慢,但也能看出现实中的女性群体在男性书写中不断扩大的影响。作者对三类女性形象的塑造,体现了17世纪西班牙男性对于女性的态度,同时也让我们了解到社会对女性的认识也会随着历史的变化而变化。当社会历史向前发展,女性对于社会的贡献越来越显著的时候,男性们不应再怀有偏见和忌惮,而应当肯定和接受。只有这样,格拉西安们笔下的女性才能真正摆脱充满偏见与忌惮的形象,成为真实的人。

Prejudice and Fear: Three Types of Female Images and Their Significances in Baltasar Gracián's *El Criticón*

LU Yi-ting

(1. School of Liberal Arts,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1, China;

2.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3, China)

Abstract: Women in *El Criticón* are mainly divided into three categories; the polarized ordinary women from high and low classes, the divine women symbolizing good and evil, and the imagined ideal women who are both perfect and flawed. In general, the book holds prejudice and fear against the three types of women, which should be attributed to the influence of Catholic patriarchal ideas and the family and society. Baltasar Gracián's personal experiences determine his subjective view upon women, but this book still offers an objective view upon the women living in Spanish society in the 17th century, who also influenced the male authors' views on women.

Key words: *El Criticón*; Baltasar Gracián; female images

(责任校对 龙四清)

^①Coster, Adolphe. *Baltasar Gracian*. trans. Ricardo del Arco y Garay. Zaragoza: Institución Fernando el Católico, 1947, p.3.

^②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妇女联合会:《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妇女》,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7页。